



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

乔洪武 郭亮 叶雨晴

摘要: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时也应包括经济伦理的教育。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认识和了解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的演化变迁,并为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经济伦理教育的关键环节是:在介绍西方经济学流派或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时,应拓展对其思想渊源的伦理基础和经济思想的伦理特色进行评述。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时,应增加对其价值判断的伦理评判。在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结论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时,应深化对其伦理导向的道德分析。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教育

当前,我国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比较强调数学逻辑方法,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高度数理化的发展态势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经济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西方经济学本身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对经济道德的科学认知和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因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时也应包括经济伦理的教育。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从历史上看,早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就有许多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问世。在中世纪,西方经济学是神学的“奴婢”,以后成为“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最先就是以《道德情操论》而成为英国第一流学者的。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在随后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又进一步论述了“看不见的手”原理,由此产生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在斯密看来,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本身并不自然带有道德上的贬义,而理想的道德总是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承认人的自利追求和私人利益目标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将人类的自利动机整合引导到有利于经济走向公平、和谐的社会道德谱系之中。这种整合机制便是“公正的旁观者”,即代表社会正义的“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的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指代表社会正义的法律和一整套制度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激励和导向。在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中,洛克、休谟、西斯蒙第、边沁、穆勒、埃奇沃思、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诺思、西蒙、阿马蒂亚·森等众多经济学家都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方面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史

学家诺思就把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在“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更是明确指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工程学的,另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我们不能否认,工程学的方法可以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但是,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动机观’所提出的深层问题,应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特别强调:“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正是因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①。森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于他通过经济学和哲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把伦理因素重新纳入至关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因而他又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包含有丰富深厚的经济伦理元素,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科学事实。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学和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正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基础性指导作用一样,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对西方经济学来说也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认识和了解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依据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例如,自亚当·斯密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一直以功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美国经济学家G·J·施蒂格勒就曾指出:“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是功利主义”。^②那么,作为一种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势必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对功利主义对西方经济学发生的误导作用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施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即使我们能够证明富人的钱转移给穷人可以增加功利意义上的福利,我们也没有证明多少东西。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不引入功利主义的假设,……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拯救许许多多乍看起来被功利主义偏见弄得不可救药的经济分析。”^③而对于功利主义的科学认识,倘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指导和经济伦理的判断与分析,我国的大学生就难以从辩证法的高度认清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和先天不足。

其次,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自“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西方经济学虽然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它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自利是最基础的人性。第二,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第三,强调市场自由化,迷信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这一前提和核心就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在人性论上坚持性恶说;在权利与义务关系学说中坚持权利至上;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坚持个人自由至上。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就是对上述价值取向最有力的辩护。他在该书中指出,现代政府,在其规范意义上,应当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只有充分限制了政府权力,避免对市场交换和分配加以过多干涉的“最小国家”,才能充分保障和尊重个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从而才可能是道义上最符合正义原则的政治制度基础。诺齐克的著作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道德哲学基础,也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政治哲学的论证。由此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蕴含着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刻意回避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伦理取向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而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

①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13页。

②G. J. 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26~27页。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6~207页。

及其政策导向中的价值取向,是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建树及其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

第三,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的演化变迁,为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每一种经济形态都必将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又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维护、巩固和促进的作用。在伦理道德体系中,最直接感受和反映社会经济生活脉搏跳动的乃是经济伦理。经济基础对伦理道德的决定作用首先要通过经济伦理的变化而逐渐波及伦理道德的其他组成部分,而伦理道德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也以经济伦理为纽带和桥梁。在市场经济中诞生的西方经济学说,就是推进市场经济扬帆远航的东风,直接担负起了从催生市场经济到使其基本完善的伟大历史任务。它既铭刻欧洲社会由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变化的轨迹,又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规定出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它的发展与演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完成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深刻的启示。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已经深刻揭示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进步的内在规律,他指出:“当经济富裕的境地已经达到,财富的累积已经失去了高度的社会性时,社会的风俗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有许多伪道德已使我们受累了二百年,在这些原则下我们把人类性格中某些最可厌的成分抬举了起来,看作是最高品质;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胆量地按照它的真价来评价。同样是对金钱的爱好,有的由此造成了占有欲,有的则以此作为享受与维护现实生活的手段,两者是大有区别的;那时,对前者的真像就可以有所认识,那是一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①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进步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的自生过程,它不仅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法治与适度干预,也需要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公民自律。显然,凯恩斯的上述论断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道德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启示意义。

第四,有助于大学生(尤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增强其以正确的经济伦理立场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如上所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和核心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自利是不变的人性。但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识之士都明确强调,“经济人”只具有分析工具的价值,决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价值。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指出,经济人只是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人们却决不能因此产生以下误解:“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②作为经济学学者,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不能脱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必须用我们的伦理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后的公断人,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所得来的与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③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学者不能首先将自身演化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经济学学者理应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的良心。“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④由此可见,真正的经济学学者是比纯粹的“理性经济人”有着更高的道德信念与人格追求的人,他们是“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当今中国有志在经济与管理事业上大展宏图的莘莘学子通过上述经济伦理的学习和教育,不论是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其人生理想和远大抱负,都有望得到全面提升。

二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育,应当着重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以为,首先应当在以下几个环节中加强经济伦理方面的教育。

①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78页。

②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3页。

③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8页。

④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7页。

第一,在介绍西方经济学流派或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时,应拓展对其思想渊源的伦理基础和经济思想的伦理特色进行评述。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在(当代)经济学变得更为专门化和更为技术化的时期”,“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被证明在下述意义上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即如果没有得到某一个哲学家的指导,他们就不能得出任何已经得出的某种分析上的结论——除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和争论以外。”但在另一方面,“对于作为人和公民的经济学家来说”,“哲学对他们的一般态度和眼界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对此,“答复就不同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他们不可避免要学习一些哲学”。“这个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可能说出类似的话;他们对哲学的研究肯定把他们变为了更文明的人。”^①也就是说,熊彼特认为,哲学伦理学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现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有重要影响的。而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现象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当抽象上升到哲学层面时,必然会打上当时某种哲学伦理学理念的烙印。正因如此,熊彼特把1790—1870年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抽象归纳为功利主义。对于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E·K·享特认为,它是“个人主义和伦理上的功利性享乐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②,它的共同特征是:“(1)他们都捍卫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所有的基础性制度,并简单地认为这些制度是天经地义的;(2)他们仍然认为,经济行为是独立的、自利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的行为;(3)他们都捍卫新古典理论的三个基本信条或与之相似的看法。尽管各自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总体看法继续反映着食利阶层的社会观念。”^③显然,在介绍西方经济学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时,对其思想渊源的伦理基础和经济思想的伦理特色进行评述,将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清西方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

第二,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时,应增加对其价值判断的伦理评判。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实证化、模型化和数理分析化为主要特征。但在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选择的背后,仍然隐含着某种伦理特色的价值判断。早在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所展开的大论战中,德、奥及英法等国的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是否应当包含价值判断展开了激烈争论,“在1909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几乎达到相互争吵的地步。”^④反对者认为,经济学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否则就不能保证经济科学的“客观性”。支持者则认为,至少到约翰·穆勒时代,英国经济学的传统一直就是“他们并不曾把所有的科学分析工具连同陈旧的价值判断一起扔掉。”^⑤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是否应当包含价值判断的立场是:“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对环境具有典型的历史的辩识能力,并认识到应将价值判断与一定的环境结合起来,他就可能提出历史性的相对建议,而又不失他的专业职能的本分。这将多少(尽管并不完全)有助于证明经济学家作出价值判断是正当的。”^⑥这表明,熊彼特并没有完全否定价值判断在经济研究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模型选择上总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前提的。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早使用微积分的数学模型之一——由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创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模型为例,该模型依据“土地报酬递减律”,提出了一般“生产力递减规律”:如果资本数量不变,每一个新增的工人将提供越来越少的产品增量;如果劳动耗费量不变,每一个新增的资本将提供越来越少的产品增量。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劳动和资本各自追求自身报酬的努力,必然会使它们停留在最后的也即边际的生产力水平上,也就是说,“分配上各个份额应当得到多少,是由最后生产力决定的。这样,利息是由最后增加的单位的资本的生产量所决定的,工资是由最后增加的单位的劳动的生产量所决定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都是依靠这个普遍规律来决定的。”^⑦克拉克的这一分配理论自20世纪初提出以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2~44页。

②E. K. 享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③E. K. 享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

④《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1页。

⑤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6页。

⑥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4页。

⑦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9页。

来一直被当成现代微观经济学分配理论的主要支柱。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就曾高度赞誉道, 克拉克等创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模型彰显了一种“边际生产率伦理学”, “有关收入分配的生产力伦理学的感召力, 不仅获得了来自公众的广泛支持, 而且在经济学家们(中间)也对这种伦理学表示支持。”^①但实际上, 该模型一经提出, 就被视为一个“反动的怪物”, “因为他(克拉克)又进一步断言按照边际生产力‘规律’进行分配是‘公平’的。正是这一点在大多数成员对理论无论如何也不抱好感的经济学界心目中, 把‘克拉克的边际主义’和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这二者联系在了一起”^②。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就曾指出: 克拉克的分配理论故意忽视了“资本”和“资本品”这两者概念上的区别, 资本“是一个有关法权、合同和买卖的问题”, “是一种所有权的连贯性”, “事实上, 这种连贯性具有非物质性的本质”。“这个事情显著状态被忽视的原因就恰如它有点儿精心设计但又让人不容易看见一样……(不忽视这个明显的事实)当然就可以推翻劳动和资本的‘自然’报酬规则, 这是克拉克先生从开始就期望得到的结果。”^③

第三, 在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结论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时, 应深化对其伦理导向的道德分析。尽管西尼尔说过, “经济学家的结论‘并没有使他有权去加上一个字的忠告’。”^④但从最古老的希腊文“经济”一词诞生起, 它就包含有对家庭及社会管理提供政策建议的角色成分。当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以后, 尽管经济学家们终于发现“原理与建议并不是一回事。”但“由于受到读者可以称之为诱引或责任的召唤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仍热衷于建议各种措施并为之奋斗^⑤。以至某些尖刻的批评家认为, 经济学家像“是处方的承办商。”^⑥而他们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建议, “不仅适当考虑到了某一情形的经济因素, 而且还适当考虑到了非经济因素。”^⑦也就是说, 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包含有在性质上是超科学的最后评价, 也就是包含有超出科学证明范围以外的偏好。”^⑧既然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不是纯粹经济的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⑨, 而是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其中当然也包括哲学伦理学的知识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分析和介绍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主张时揭示其政策导向的伦理内涵, 这本身就是完整解读经济学家的政策内涵——即其政策的经济意蕴和非经济的意蕴的一种自然要求。更何况任何的经济政策主张总是与各种的利益关系调整密切相关的, 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这诚如美国伦理学家 R·T·诺兰所指出的: “经济决策起码要影响到社会秩序中每个人的幸福和福利。因此, 在分析和评价这些决策时, 就会产生基本的道德问题。”^⑩施蒂格勒在《经济政策的目标》一文中也说: 在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即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出; 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尽量减轻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中, 前两个目标, “都是符合一般伦理的中性目标”, “而到底什么样的产出量才是最大限度的产出, 要依自由人的愿望来定, 因此这已经几乎是隐秘地表示出这两个目标所具有的伦理意义”^⑪。那么, 什么是美国的政策目标所隐秘含有的伦理意义呢? 施蒂格勒分析指出道, 同样是力求最大限度的产出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俄国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呢? 这就是, “在我国, 最大产出量主要是由各个消费者来决定, 而在俄国那种经济体制下, 最大产出量却基本上由中央集权的领导机构来确定”^⑫。至于第三个目标, 即减轻收入不均现象, “这一目标确实可以作为一个体现并构成个人主义之基本价值的重要因素, 即人道主义, 其表现形式是力图消除贫困, 以及随贫困而发生的一切现象”^⑬。由此表明, 施蒂格勒也确信, 尽管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在表面上看是无差异的, “都是符合一般伦理的中性目

①《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第 443 页。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180~181 页。

③Thorstein Veblen. “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 in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p. 197. 转引自: E. K. 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271 页。

④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230 页。

⑤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75 页。

⑥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251 页。

⑦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251 页。

⑧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250 页。

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第 251 页。

⑩ R. T. 诺兰:《伦理学与现实生活》,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 第 323 页。

⑪《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第 128 页。

⑫《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第 123 页。

⑬《施蒂格勒论文精粹》,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第 128 页。

标。”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各个国家具体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而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的经济政策必然是各个国家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核心价值观的产物,体现了各种社会文明的基本价值。用施蒂格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论经济学的说教者是引导还是跟随(某种政策主张),都需要某种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提出建议。”^①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分析对比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和俄国人的基本目标完全一样,而隐秘的伦理含义却完全不同的原因。而施蒂格勒认为“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讲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是“西方世界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即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崇拜个人主义’”^②。他甚至肯定,“如若能彻底地奉行一种崇尚个人自由和责任感的哲学信条,就可以制定出按照我们现行的标准衡量既不是很‘激进’,也不是很‘保守’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比其他公民更加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使全部社会政策都能充分体现这一(即追求个人自由)伟大的目标。”^③由此可见,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并不需要某种有说服力的伦理体系来支撑自己的政策主张,“他仅仅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算术家。”^④但在他们各种政策主张的背后,无一不是公开或隐秘地体现了某种伦理体系的价值导向。而弄清楚西方经济学家政策主张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导向,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市场经济各种政策的实质及其对我国的适用范围,是极为有益的。

诚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育,有赖于教师本身深厚的经济伦理学素养和在此方面的科学研究。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著名的宪政经济学家维克多·J·范伯格指出,自亚当·斯密的两大名著相继出版后,“道德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论著以某种方式讨论在经济理论内部道德判断的潜在作用,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时)也关注规范经济论述建立的基础;评价的最终标准的理性根据。”“第二类把伦理或道德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因此,也成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验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这方面的贡献关注作为经验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在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对于伦理或道德的解释性角色和重要性。”^⑤意即,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一方面应当注重学习、归纳和总结西方经济理论内部道德判断的潜在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关注作为经验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在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对于伦理或道德的解释性角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成果。因此,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除了应具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外,还应培养和提升自身的哲学伦理学素养,才能以睿智的哲学伦理学之眼,去发现西方经济学大师们在经济伦理方面的深邃思想。而西方经济学大师之中,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素质俱佳者比比皆是,如穆勒、凯恩斯、哈耶克等等。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就阐述了“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展示了他对人类社会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哲学思考。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尽管不是人类的最优选择,但可能是人类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次优选择。人们集中精力于发财致富总比专注于政治争斗、兵刃相见要好得多。历史发展,已然证实了他的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显然,担负着培养明天的经济学大师重任的高校经济学教育工作者,要想精准解读前人的深邃思想,提出启迪来者创新思维,首先自身要向经济学与哲学素质俱佳的方向奋进。

■ 作者简介:乔洪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郭 亮,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叶雨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21)

■ 责任编辑:刘金波

①《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6页。

②《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4页。

③《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2~133页。

④《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29页。

⑤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 and 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页。